

教师在发票报销、科研管理上的压力陡增,高校确实需要财务部门和管理部门以科学的、精益求精的精神研究各项工作的流程,站在教师的角度上,努力减少教师时间消耗,让教师们能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教学和科研方面。

报销: 缺位的高校服务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久前,一篇名为《简直没法干事了》的帖子,在不少大学教师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得火热。

帖子的主人公是一名刚刚到大学里工作的小海归,申请到一笔国际合作经费,想邀请国外的导师访问中国。为了给导师买机票,他遭遇了要求证明没有私吞国有资产、导师父亲病故机票改签、学校年底封账等挫折,被财务处、政府采购代理公司、国航票务中心支使得团团转,直到第二年才把邀请国外导师的事情敲定。

高校报账有多难?网友不禁唏嘘:“光看这文字都感到心累。”

虽然这个帖子最早发布于2016年,但就在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的若干意见》,并被视作改革科研经费管理的重要标志。时隔两年,该帖子再度在高校人士中引起共鸣,可见高校报账问题的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海归、青椒是典型

分校区,是中国大学快速扩张的一种呈现。然而,一些大学的分校区虽多,但财务处往往只有一处。每次从分校区到主校区报账,国内某高校海归教师王京在回来的路上就得花一个多小时。

王京心疼时间,如果用每次花去的一小时去指导一两名学生,意义更大。同样的情况,国外高校截然不同。“每个学院都有专人负责,把报销单交到管财务的办公室就可以,在同一幢楼办事很方便”。

办事过程繁杂是高校海归人士不适应的一点。王京举例,出国交流,国外大学只有办签证需要自己负责,其他环节可在网上填报,申请完成。而在国内高校,出国要使用科研经费,要办理公务护照,流程多还需要亲自现身,每个环节一次跑不完,且办公场所距离都很远。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这是人的正常心态。除了海归人士,青年教师也是体会最深的人群。

国内某高校青年教师林艺前年入职,不仅在教学、科研上的工作让他感到“压力山大”,院里大小杂事也都要找到像他这样的青年教师。不比教授们都研究,有时候报销可以让研究生代劳。“青年教师的报销不但要自己负责,还要扛起团队科研经费报销的任务。”林艺说。

曾有教师买发票出现了假票,从去年起,财务处规定报销金额超过1万元的发票,教师必须自己去相关网站上输入验证码查询真假,以自证清白。这个工作又落到林艺肩上,工作量陡然增加。

“如今财务处对教师的不信任程度已经上升到‘防腐防盗防老师报销’。”气愤之余,林艺也是一肚子感慨,“这本是财务人员的分内事,却因为国家减员增效的规定,导致人手不足,最后分摊到教师个人身上,让人感到很烦。”

问题出在具体报销环节

“教师们之所以意见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科研经费使用比照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催着教师赶进度花钱,按年结算到期收回;二是报销程序上的问题,具体的项目管理让人觉得不便。”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孙健夫如是说。

他进一步解释,从前各行业制度改革时,都把财政上的零基预算作为加强预算管理措施,财政渠道拨款当年年终必须清零。这就使得高校教师绞尽脑汁花光科研经费,找票据,由此带来的麻烦不胜枚举。《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的若干意见》颁布后,制度有所松绑,财政拨款可以不在年终清零,第一类问题已不复存在。

随着第一类问题的解决,第二类问题凸显。孙健夫表示,国家财政制度实行严格的经费管理,防止套取经费、科研腐败等固然没有错,但在管理上过于细过死。比如,有些打车发票是手撕票,报销必须标注从何地到何地,像这样细节的问题很多人注意不到,到财务处报销才不得不去回想,让不少教师想破了头。

在孙健夫看来,注重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却也是“情有可原”。过去餐饮走科研经费不被允许,一些教师就拿其他名目报销餐饮费用,由此产生了报销乱象;现在的规定有标准地放开了餐饮报销,但一些教师没有养成按规矩办事的习惯,一时适应不了,乱开发票的情况也是有的。

2017年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为减轻科研人员在项目经费预算和财务管理方面的负担,从繁杂的预算编制、费用报销等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所在研究单位和课题组可以配置科研财务助理,协助做好各项经费支出的工作。

事实上,在本次采访中,希望配备财务秘书或助理是受访者一致的呼声。那么,既然已有解决问题的对策,为何还会生出埋怨?

岗位和薪资是两大障碍

岗位和薪资是建立财务秘书制的两大障碍。“原来我们是想雇一名退休教授或秘书的,但让学校给你多配一个编制太难了。进人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还可走人事代理的途径,但手续办下来不那么方便,需要交劳保等各种费用。”北京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秦飞坦言。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告诉记者,中国人固有的观念是“能省则省”,但“省了小钱花了大钱,教师原本可以集中精力出成果,但被杂事耽误的损失远远高出省钱”。“几千万元经费的课题组有能力招人,但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养活自己尚且不易,不太可能再聘请一个干杂事的助手。”

因此,在喻海良看来,招聘一名秘书帮助所有教师报销,二级学院应该有所作为。但目前高校在新机制的建立上存在着“不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的心理,亦步亦趋。另外,这名秘书是否只对领导负责,而不对教师负责;由他人代劳是否会出错,出错的责任是否要学院承担,都是学院对建立秘书制的若干担心。

“最大的问题在于,秘书不清楚每张票据的来历、方式,报销的时候财务人员又要问个清楚,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写得清清楚楚,稍有不清楚的地方,秘书就得打电话一一核实,当‘二传手’,秘书也很烦。”孙健夫说。

他补充,一些科研项目众多的学院也配备了科研秘书,但主要工作是科研统计、研究生管理、课题管理等,工作不胜其烦,再让他们承担报销的工作,他们显然承受不了。

在他看来,对于课题组最了解的莫过于团队成员,让团队中的某一名教师(无学生参与的课题)或研究生(有学生参与的课题)承担科研之外的辅助性工作,给予其相应的岗位津贴,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但必须要处理好精力、报酬等关系,不给青年教师强加任务,不把研究生视作廉价或免费的劳动力。”

专家观点

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白彤东:

人文学科应用现金的方式鼓励科研

就报销问题,我可能不仅仅是强调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而是希望从科研经费方面进行改革。人文学科的科研更多是读书、教学、思考。对人文学科学者的支持,不是国家设定研究项目让他们来申请,而是让他们尽量能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所以,支持人文学科的科研应尽量采取“藏富于师”的办法。如今,我国国力富强,但至少对人文社科而言,很多鼓励科研的办法最终反而妨碍了科研。

人文学科的经费应该少而精。其他剩下的钱,应该尽量划拨到直接主管部门,比如

“规模较大的科研团队,设秘书专岗的意义并不大;学院相对较小、工作单纯,设秘书专岗更为合理。后者的前提是,学校在编制,至少是经费上予以支持。”孙健夫说。

简化流程须科学研究

不得不说,相对于前些年,我国高校财务管理确实有很大的改进。比如,不少高校采取投递制,老师只要把票据整理好,放在财务窗口,就有财务人员完成审核、报销工作,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所有人排队等待报销。

“高校也许会说‘与其他学校相比、与以往相比已经好了很多’,但这种习以为常的心态恐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并没有思考怎样做才能一步到位。”喻海良说。

细节很可能影响高校发展的战略落实。“在《简直没法干事了》这篇帖子中,青年教师邀请海外导师到本校讲学,如此复杂的流程跑一次也许可以,第二次还会照做吗?魔鬼藏在细节中,机制上的不顺最终将影响大学国际化战略的落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感叹道。

如何对流程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培训?卢晓东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转机,因上一趟飞机延误,导致转机回国中间只剩10分钟时间。如何保证乘客不误机,飞机和机场都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把乘客升到头等舱,这意味着乘客可以第一个下飞机;其次,调整行李顺序,保证该乘客的行李可以被第一个取出来,快速转运到下一个航班上;最后,出口处安排陪同人员陪着乘客跑到下一个登机口。

“没有之前系统的研究和后期培训,如此高效率的流程是不可能实现的。”卢晓东说,美国有一个本科专业就称为“操作研究”(运筹学(operation research),是美国上世纪基于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发展而来,在二战后工业恢复繁荣期间得到广泛应用。后来其知识内容聚集成一个管理学中的本科专业,研究如何把流程和操作科学化、规范化、简约化以提高效率。

他指出,在我国高校服务工作中,当前非常缺少操作研究。随着近年高校财务管理规定严格化,教师在发票报销、科研管理上的压力陡增,高校确实需要财务部门和管理部门以科学的、精益求精的精神研究各项工作的流程,站在教师的角度上,努力减少教师时间消耗,让教师们能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教学和科研方面。

“就像政府部门的网络办公,高校也应该减少人力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减少必须本人出面的环节,尽量让流程网络化,而不是完成所有环节,最后一步才在网上办理。”喻海良补充道。

炒作副院长背后的「官本位」意识

■尤小立

前不久,西南某所大学的一位28岁的海归博士担任二级学院副院长的消息被媒体热炒,有的网络新媒体更是以“刷爆网络”为标题来吸引网民的眼球。

媒体报道大学当然是好事,但总有别个别的媒体向壁虚造,将大学里原本常见的事情当作“新闻”,把原本不应该提倡的倾向当成“正能量”去无限放大,以致负面意义不断扩张,影响大学改革的进程。

当下的中国大学虽不能称为象牙塔,但其封闭性仍相当严重。一些地方的“大学城”原来是强调各校之间的相互交流、互相渗透、共享资源的,现如今却以维护安全为名自筑栅栏、电网,光荣地孤立。正因为有类似“光荣孤立”,大学以外的老百姓不了解校园内的情况也就是必然的。

网络传播的特点之一便是跟风,一个“新闻”被一些人点击后,就容易引发不明就里的人跟风点击,结果真是“刷爆网络”了。但考察新闻的价值,不能仅仅依赖传播的广博,新闻本身的意义也同样值得注意。

应该看到,28岁的教师担任二级学院副院长在大学里并不是鲜见的事情。一位青年教师是否合适放下初见光明的科研工作,转而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行政工作,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更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从来都有攀比意识。这所大学有一个28岁的副院长,那所大学就可能提拔一个27岁的,以后副院长中的“年轻化”如果缺乏文件的限制,可能就没有底线可守了。

老百姓不了解大学的情况,在社会上“官本位”意识依旧浓厚之时,他们以此作为“正能量”是情有可原的,但大学的从业者也如此这般地想就成问题了。

在过去十几年,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和提倡大学的“去行政化”,其目的是让中国大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精神和原则。“去行政化”从来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它是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

以二级学院的领导职务设置为例。发达国家的大学的这一级领导职务(即系主任)多是由系(学院)内教授轮流担任。既然是轮流担任,自然无所谓行政级别可言。其实,国内一些名校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而且管理的效果并不比有行政级别时差。至于二级学院的副职(副院长),在一些国内名校也是辅助性职务,通俗地说就是“干活的人”。以此来看,28岁的海归荣升副院长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更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现在二级学院改革的难度主要在于利益分配。从多数大学的情况看,行政级别的保留和取消仿佛是一大焦点,但深入地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一种表象,行政级别存废的关键还在于其中潜存着的利益。简单地说,有无领导职务在利益分配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这也是有些具备教授、博导头衔的教师还有争夺领导头衔的强烈意愿和热情的原因。

从理论上说,大学内部的利益差距是衡量大学是否“现代”的标准之一。大学不是官场,所以她也不追求权力;大学也不是市场,所以地也不追求金钱。权力造成等级,金钱造成差距,大学无论作为教育机构,还是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蔡元培语),都恰恰是以破除等级和差距为目标的。

因此,在大学中要消除等级、缩小差距,就要改变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方式。

当然,这是就改革的终极目标而言的。在现有条件下,以公开化和协商方式“去利益化”是比较容易实施的。公开化是指公开所有的与教职工相关的资源,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也是为了更好地监督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商才有意义。

协商的方式之所以在大学里更为适宜,不仅是因为大学的从业人员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协商本身也是一个学生会生活、学会相处、学会阐明观点和判断是非的学习过程。作为教育者需要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任职条件与资格,以便更好地承担教育的责任和义务。

思想层面的“去行政化”就是要祛除“官本位”的意识,这一点对于大学管理者或许更为重要。网红的“副院长”事件并非值得阐扬的励志故事,因为它代表了大学改革的方向,当然也不应该成为一所大学自我宣传的手段。

(本报记者陈彬、见习记者许悦整理)

两会,就在我们身边

每年的3月初,两会无疑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而在这些关注的目光中,自然也不少了来自高校的莘莘学子。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广大高校的师生通过电视、微博、微信等各种方式和平台,密切关注着两会近况。与此同时,代表委员们也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学生们——两会就在他们身边。

代表委员来“上课”

3月15日是今年全国人大会议唯一的休息日。然而在这一天,人大代表们却没有几个能真的停歇下来,他们有的在为一阶段会议作准备,有的在与媒体交流,还有的化身知心“教师”亲自走进大学校园,为学生们带来难忘而又精彩的一课。

就在这一天,清华大学的一间学习室内,空军航空大学校长付国强、“金头盔”旅长许利强、新型运输机飞行员冯玮三位代表同空军与清华、北大联合培养的16名飞行员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两夺“金头盔”的航空兵某旅旅长许利强的一句“咱们就是师兄师弟的交流,可以随便提问”瞬间让气氛变得热烈轻松起来。

在共同交流中,代表们就像兄长一般,仔细地询问了飞行员们学习、锻炼的情况,并且向大家介绍了我国国防和军队发展的规划部署,激励学员勇敢前行,帮助飞行员们理清了未来需要努力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去看一看党的十九大报告,看一看国家需要你们干什么,那就

去干什么!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党的伟大事业当中去,才能获得事业的成功、个人的成长进步。说实话,我很羡慕你们!”新型运输机飞行员冯玮激励学员道。

这并不是清华今年第一次迎来两会代表。事实上,就在前一天,贵州代表团的五位全国人大代表和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已经走进了清华大学,参加第三届“两会代表进清华”活动,共话新时代青年责任。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代表委员围绕文化传承、电商、大数据等热点话题,和清华学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代表进校园,拉近了两会与校园的距离,更拉近了“代表”与学生们的内心。

学生看两会

两会的召开正值新学期的开始之际,同学在充满活力地投入新学期之时,也迎来了“第一课”——看两会。在两会期间,很多高校都组织学生收看了两会的直播,并进行讨论。

“我们应该从各行各业努力,把真抓实干做到位”“我们要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教室内,认真观看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聆听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后,现场的学生正踊跃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两会召开期间,在北京大学出现的这一场景,国内大部分高校都在上演着,从新疆到山东,从黑

龙江到海南,祖国各地的大学生都在用自己的双眼关注着这一举国盛事。而他们的关注点又与自己的“身边事”息息相关。

比如,在上海交通大学,来自西藏的少数民族学生普布泽仁关注的是国家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惠民政策;而作为一名资源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该校本科生王艺晨最关注的当然就是“三农”问题;晋雅是一名伊朗籍留学生,在观看两会时,她更加希望未来能为“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为中伊两国的长久合作及交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两会像一条纽带,串起了每位学子的希望与梦想。

观点齐“爆发”

新一代大学生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群体,在各大新媒体上总能迸发出各种新奇见解和观点。两会期间,各大高校的学生们也纷纷积极参与到各大媒体线上的交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近日,国内某些媒体便发布了“十大青年热点话题”,此举引来了广大高校大学生的“围观”、点赞。“就业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是巨大的挑战”“奖助学金申请环节中繁杂的证明过程可否尽量简化”……网络上,学生们的一条条评论都是最贴近群体自身的务实发言。他们建议的背后代表的是高校大学生这一群体最本质的需求。

除了媒体网络平台,各大高校自身也在两会



“两会代表进清华”活动中,代表与学生互动交流。

期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努力鼓励学生了解、参与两会话题。有的学校在微信中推送两会相关信息,有的在校园官网开辟了两会专栏……

组织参与这场话题大讨论的除了高校和媒体之外,也少不了普通教师的身影。在温州大学,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项淳芳便别出心裁,利用手机移动平台发起了一次关于“两会,我想对你说”的话题讨论。此举得到学生们的积极响应,百余条满怀热情的留言让项淳芳惊喜连连。这些留言中,既有对五年来祖国新貌的赞美,也有对未来发展期盼。正如项淳芳自己所说:“确实没想到大家这么积极认真地评论,我要为他们点赞!”

是的,我们要为每一位关注两会的学子点赞,但除了他们,值得点赞的还有两会本身。因为我们知道,两会从来都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校园里,就在学生的眼里、耳里和心中。